

小农大国的优势

张霜杰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DOI:10.12238/as.v7i6.2601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央政策的理解,来探讨三农发展的难题,在丰富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为国家基础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采用分析法和归纳法,得出的结论是农村作为城市经济危机承载者如今面临着衰败的可能,改革阻碍“三农”发展的机制,从而跳出“中等国家陷阱”。本文认为适宜的解决措施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这既符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也利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小农大国; 二元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 D267.2 **文献标识码:** A

The advantages of small farmers and large countries

Shuangjie Zhang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hrough an understanding of central policies. While enriching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it provides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bas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is article using analytical and inductive methods is that rural areas, as carriers of urban economic crises, are now facing the possibility of decline. Reforming the mechanisms that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can help break out of the "trap of medium-sized countrie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appropriate solution is to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surplus rural labor, which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ut also conducive to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ssues; Small farming country;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引言

中央曾有过“小农大国”的论断,我们必须找到一条与小农经济相协调的农业发展模式。城市和农村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国家发展的两面。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一般原理,一面的发展会带动另一面的进步,如果一面衰退了,势必将引起另一面的动荡。因此,本应该是没有主次之分的正反两面,可是农村在过去、现今以及未来都不可避免地位于城市发展的次要和辅助地位。此外,一种很难打破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正塑造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我们能做的唯有将农村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使之与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让二者相辅相成,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城乡融合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

1 小农的重要性

自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三农”对国家的贡献可谓是居功至伟,然而农民却未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与城市市民平等的福利。首先,建国初期财政高赤字、人民币贬值,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吸收了市面上大量的货币,从而平抑了物价,使得国

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其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农村接纳了大量城市无业劳动力,缓解了城市危机。再次,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贡献其最廉价的劳动力,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最后,90年代之后,随着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迅速发展,农村又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及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房屋的征收征用,国家对此采用“剪刀差”的形式,为城市至少节省了几万亿资金。现如今城市的繁华与农村的衰败形成鲜明反差,已经到了“反哺”的时候,或者说现如今乡村的发展应该放在国家政策的首位。

2 小农经济现状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是中央集权模式和地方乡土自治模式相结合的“双轨政治”,由此可知,传统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先赋性和伦理性的整合,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依靠宗法的、亲情的伦理关系来维系,是一种由熟人社会构建起的乡土人伦”^[1]。然而,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运作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农村乡土人情的熟人、社区关系,也改变了原有的代际情亲关系。

此外,市场化运作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让原先设计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越来越不适应乡村治理现状。原因有二:一方面,对于承包户而言,很大一部分群体陷入低报酬,尤其这些年甚至成为停滞的家庭小农经济,单靠农业收入根本无法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迫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至城市打工补贴家用。农村的生产生活连农民自己都认为是低下的、没有前途的,农村成为农民希望离开的地方,城市成为农民向往的家园。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年轻人进城打工,获得城市最低劳动收入,住着最杂乱破小的屋子,没有城市市民身份认同感,更无法享受市民基本社会保障,受尽冷眼与欺压。而且农村的父母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盼望子女能够考上大学,逃离农村。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村委会等组织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使得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基层组织威信大大降低。例如:陈永汉村委会委员在协助政府征地时,骗取征地补偿款以及自留地面积,陈宗光村基层组织人员非法出售村集体土地,收受巨额财物^[2],从而引起广大群众极其不满。

3 小农大国优势

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农民提供大量剩余廉价劳动力推动,并凭借广大农村转移一次又一次的城市经济危机来维持发展。现如今的农民收入低甚至停滞不前,由此造成的重大危机之一是农村衰败愈发严重,这些“三农”问题是经济发展所难以避免导致的,也一定要靠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来解决。当作为现代工业丰盛储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并获得可观收入之后,中国经济将全面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3]。换句话说,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过渡到以资本投资型为主的发展战略,再到最终转变成今后依靠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模式来予以调整,以便在全球经济分工中谋求更高层次让人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财富,而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战略要求。

目前,对于农业经营模式,业内人士有着一种基本共识,即仅凭农业生产可获得的低收入唯有国家发展到更为高度的城镇化并同时减轻农村人口压力,以及建立适度规模农业之后,方可得到妥善解决^[4]。这就要求维持既定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才能赋予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用以防止贫富差距大规模分化,凭借此稳定农村的基本结构,以免社会出现不可控的尖锐矛盾,即城市市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矛盾。

同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曾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二元结构模型,其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剩余的大量劳动力将会为现代工业提供无限廉价劳动力。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实际可获得的薪资报酬处于差不多相同的阶段,也就意味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市场的形成,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第二个转折点。这种理论,学界将之称为“刘易斯转折点”(The Lewis Turning Point),本人认为其观点主要涉及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收入低、劳动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具有潜在过剩的农业无限劳动力的供应,进而造成了一

个二元经济体系,其中一元是传统的,由于其劳动力过剩,所以是低报酬的;而另一元则是现代化工业部门、是高报酬的。因此,只要现代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可获得的既定工资,从事农业人口必将会大量涌入工业生产部门,即现代经济发展必定会导致现代工业部门完全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折点”。在那个转折点之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将会显著提升,达到与现代工业部门同等水平为止。此经济发展理论将经济部门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农业部门,另一种是现代工业部门。然而其片面的强调现代工业发展的主导地位,农业部门却只处于工业部门的附属地位,同时忽略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益。然而本文不太同意其观点,因为支撑其理论依据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慢慢形成的二元经济体系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国一贯将农村视为经济社会发展“蓄水池”和“稳定器”,当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工业部门找不到工作时,必然会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不管是人口红利的减少,还是经济增长率将处于5%的阶段,经济增长所依靠的一般发展规律始终是从人口密集型到资本投资型再到产业技术升级型,由此发展三阶段可知现代工业部门很难完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所以这种理论是与国情不相符的。

相对而言,我国业内人士普遍达成一种共识因为中国乡村发展的投资空间很大,所以至少还有20年的经济增长期。实际上,不仅仅只是乡村的投资空间很大,县域小城镇也有很大的投资空间。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等问题,乡镇目前就有很好的转移过剩能力的很大空间,例如“家电下乡”或“产业下乡”,因而县、镇、乡也可以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当中。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经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两大困境,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般规律。同时,有关专家还指出:“西方国家曾经遭遇的产能过剩和生产不平衡问题是通过爆发两次世界大战来解决的,但是我国现今遭遇的双重过剩问题不可能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解决,只能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采用以发行大量可控国债和地方债券形式投资用于广大新农村建设,也许有可能缓解因双重过剩条件下造成的恶性循环”^[5]。

此外,另有一种理论被广泛称为“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其概念指的是:当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而社会利益结构固定化,各种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加,社会结构的弹性持续降低。同时随着不同利益结构的日益固定化,社会基本面冲突无法调和,乃至发展成为可怕的政治冲突,工资停止增长,技术产业结构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最终导致的是越来越迥异的利益诉求与增长缺乏动力的经济形成尖锐的对立矛盾,此番情形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健康增长。换句话说,当发展中国家不能成功的迈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就导致了所谓的“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其重要特征为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其提出的问题包含了制造业

产业升级,人口老龄化,以及涉及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为内容的人力资本费用,为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就必须进行产业技术创新升级,在保持整体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6]。不可否认的是,当中国城市化或城镇化进程加快时,农村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进一步向城市流出,农村因保持着原有的产业技术模式,那么衰败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然而,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稳定器”和“蓄水池”,农业为农民提供收入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政府必须为维系农村基本秩序提供政策和资金扶持。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医疗水平提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提倡的“人多力量大”,当时的政策鼓励多生多养,现如今那时出生的大量人口基本上都已进入老年化阶段,给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很大的财政负担,也因为后来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造成很多独孩家庭养老负担。作为“底线问题”,农业靠谁来实现?农民的出路在哪?农村怎样繁荣?不言而喻,“乡村振兴战略”事关国家现代化,事关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

4 结语

根据前文所述,不管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人口红利是否降低,我国定会走出中等国家收入陷阱。简而言之,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发展最大的潜力在乡村,最大的短板也在乡村。本文以为,我国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经济配合“绿水青山式”的特色农村产业是当前基本策略。换言之,过去的“上山下乡”发展到“家

电下乡”再到现如今的“市民下乡”,农村从曾经的转移城市危机的着陆点,到如今亟需打破城乡对立二元结构,以便适应“农二代”、“农三代”观念转变,对此问题,制度配套先行,走城乡互动发展模式,补足短板,释放农村潜力。

【参考文献】

[1]张蕾蕾.读《乡土中国》[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1(3):92-94.

[2]《温州公布五个村干部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参见:<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AGG53U0U00014AEE.html>,2015年01月21日.

[3]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7,(04):74-88+205-206.

[4]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J].读书,2006,(10):118-129.

[5]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23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参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47260.htm.

[6]贺雪峰.为谁农业现代化[J].开放时代,2015,(05):36-48+6.

作者简介:

张霜杰(1988--),男,汉族,江苏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国家经济安全。